

今昔

今昔  
芳  
依

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校友通訊集



香 港  
中国新闻学院  
校 史 通 讯 集

1939—1989

# 目 录

-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成立宣言 ..... ( 1 )  
对香港分会的希望 ..... 逸 群 ( 4 )  
对中国新闻学院的希望 ..... 思 幕 ( 6 )  
金仲华先生是怎样离开星岛日报的 ..... 刘逸生 ( 9 )
- 中国新闻学院简史 ..... 钟 华 ( 15 )  
中国新闻学院历届领导人 ..... ( 27 )  
中国新闻学院先后任教导师 ..... ( 28 )  
苦斗中的中新社 ..... 叶乃坚 ( 29 )  
“政经会”对我们的培育 ..... 唐葆华 ( 35 )  
光，总是要放射的！ ..... 叶友秋 ( 45 )
- 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广州校友会正式成立 ..... ( 49 )  
梁若尘老师致开会词 ..... ( 51 )  
杨应彬同志讲话 ..... ( 53 )  
刘思慕老师的书面祝词 ..... ( 56 )

回忆郭步陶院长.....	颜焰新 (59)
刘思慕院长二三事.....	颜 舒 (62)
思慕.....	陈 前 (64)
乔老师的妙语及其它.....	杜启芝 (65)
萦怀师友.....	林金枫 (67)
师恩难忘.....	何 楼 (70)

最珍贵的和最遗憾的.....	司徒坚 (73)
我说几句话.....	曾公民 (77)
毕业以后.....	郑 枫 (78)
“中新”同学创办《新工商》.....	甄石绩 (80)

同学录的故事.....	颜志仁 (82)
忆“中新” 念战友.....	林仪贞 (86)
永远难忘的回忆.....	赵荣芳 (90)
忆旧.....	周其明 (95)
往事萦迴忆师友.....	黄 稔 (98)
难忘的老师 难忘的生活.....	陈 哲 (102)
“中新”杂忆.....	周英颖 (104)
温暖的家庭.....	陈妙济 (108)
“中新”给我力量.....	赵岳明 (110)
群星璀璨话当年.....	林鹏健 (112)
学习与追求.....	容少章 (114)

难忘的革命情谊	莫 庸	( 116 )
忆“中新”函授班	卢勉吾	( 118 )
珍贵的一瞬间	吴轼根	( 120 )
一个没见过老师的学生	陈 江	( 121 )
我这个校外同学	张子燮	( 124 )
“中新”校友欢叙简记	陈君卓	( 127 )
读母校文集抒怀	曾 唯	( 131 )
怀念陈冠时	黄淑暖	( 132 )
斯人已逝 业绩长存	唐葆华	( 134 )
后记		( 137 )
照片之页		( 139—184 )

#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 香港分会成立宣言

我们深信，新闻事业是社会进化的大动力，因为新闻纸的作用，不但可以宣传民众教育民众，而且可以组织民众，使民众发挥最大的力量，贡献社会。我国新闻事业之落后，无庸讳言。在民族复兴运动中，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已成为当前急务。而这一责任，却首先落在我 们新闻记者身上。新闻记者是新闻事业的灵魂，只有具备了无数精干健全的新闻记者，新闻事业才有改进之可能。锻炼我们自己，培养新的干部，从而促进中国新闻事业之发展，就是组织本会的唯一目的。

我们是一群青年记者，我们热诚盼望与当地一切青年记者合作。这里所谓“青年”，原非对年龄有所限制，而只着重于青年的特质，凡是纯洁、勇敢、积极、坚强、前进而富有活力的当地记者，我们都期望与之亲切携手，结集在本会旗帜之下，共同奋斗。

新闻记者之被称为“无冕之王”与其说是社会赋我予们以权威，无宁说是社会加重我们的责任。我们决不应滥

用“无冕之王”的权威胡作妄为，而必须负起“无冕之王”的责任尽力社会。我们要勉为一个新时代的记者，我们要具备四种基本精神：第一，团结精神。我们不但要从团体的观点上，做到会友与会友之间精诚的团结，而且要从新闻事业的观点上跟一切中国新闻记者团结，从民族国家的观点上跟全国各界同胞团结，用钢铁般坚强的团结力，推进我们的事业。第二，学习精神。跟同业老前辈学习，跟读者学习，跟一切民众学习，从书本上学习，从工作中学习；用集体的方式学习，用批判的态度学习。第三，进取精神。无论在营业方面，设备方面，编辑方面，或采访方面，必须沿着历史发展的方向，顺应客观环境的要求，随时扬弃陈旧的方法，创造新的作风。绝不保守，永远前进！第四，苦斗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要忠于自己的事业，发挥青年记者苦干战斗的本能，克服工作上一切障碍。所有这些精神，都是我们青年记者所决心锻炼者。今后我们愿把这些珍贵的精神在具体表现上取得社会的信任。

本会适在国际漫天风云、祖国遍地烽火的时代中诞生，今后也将在同样的环境之下长大，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艰巨。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一切，大至生命，少至一根头发都为民族国家所有。我们愿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所能，贡献祖国，祖国苟有需要，虽赴汤蹈火而不辞。我们今日，虽然身居异域，而此心耿耿，时刻不忘家乡，我们随时准备追随国内同胞，回国服务。

近年来本港侨胞新闻事业，颇具进步，唯较之客观形势所需要和侨胞所期望者，仍有很大距离，如何改进侨胞报纸的质量？如何加强侨胞报纸的效能？如何通过报纸提高侨胞的爱国热诚，坚定侨胞对祖国复兴的信念，并加强其团结？如何促进友邦和平人士与我们的友谊？我们甚愿追随当地同业和一切侨胞，尽最大的努力。

本会的成立，得力于社会人士者甚多，我们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今后会务的发展，仍有赖于当地同业、各界侨胞以及友邦人士指导与扶持，希望不断给我们以助力。

（原载1938年10月30日香港《大众日报》）

# 对香港分会的希望

逸 群

关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组织的意义和任务，在总会所出版的各种刊物上，在各地分会的刊物，大家已讲得很多，知道得很多，用不到再说。

香港，在过去是华南的新闻中心，是全国三大新闻中心之一，自天津上海撤退之后，香港成为南北报人、南北报纸的集中地。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报纸之多，非国内任何一处所能比得上。以学会讲，在年度制未施行之前，全国十七个分会共有会员千余人，而香港分会就有一百多个会员，数量上较任何一个分会多；我们的会员都是有火一般的热情的青年人，学识经验都需要努力学习，而香港的会员中则有不少文化界、新闻界有历史有卓异贡献的老战士，在质量也比任何一个分会高。香港是沟通海外与国内的驿站，地位上极为重要，而且香港分会在今天是海外的唯一分会，把散布在海外的新闻工作者与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密切地团结在一起，是香港分会议不容辞的任务。

以香港地位的重要，会员的多，而且集中这样多的优

秀人材，香港分会是应该在全国范围内以最优秀的工作起模范作用的。这不仅总会以此期望于香港分会，各地分会亦以此期望于香港分会，我相信香港的全体会员都会以此作为努力的目标的。

香港分会成立一年来，的确做了许多工作，如创办中国新闻学院，训练了六十几位新进的新闻工作干部；出版《青年记者》，从没有间断过；举行各种学术性的座谈会与演讲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等等，都有相当成绩。但我们能不能以这些工作成绩为满足呢？不。照我们这些会员的能力，显然没有发挥到最高度，我们的会还没有能够发挥高度的组织效能，无论对内的自我教育，集体学习，与一般新闻工作的效果上都还有不少缺点。

个人的意见，认为今后应该负起下列各项任务，并切实做到它：

第一、会应该经常注意会员的生活、工作、修养，而且尽量帮助会员解决各种困难问题。会与会员之间成为互相推动，互相呼应的有机体。

第二、香港分会应负起发展海外会务的责任，把华侨报纸比较集中的区域组织起分会或通讯处来。

第三、“从国内新闻从业员的团结到国际新闻从业员的团结”是学会的中心目标之一，但这个工作并非国内其他分会所能负担，香港分会应该“引以为己任”，把对外国同业的联系与合作，列为中心工作之一。

（原载1939年10月13日香港《星岛日报》。  
《青年记者》第42期）

# 对中国新闻学院的希望

思 慕

本会主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已于二十四日正式成立了，我们站在本会的立场，对于这个新生的婴儿有几种热烈的希望。

首先，我们的“学会”并不是寻常的学术团体，而是一种“集体自我教育”的组织。因为我们不独要会员彼此之间互相切磋，而且要有志于新闻工作的青年大伙儿研究，我们才有这个学院的设立。集体自我教育这个学院的设立，集体自我教育的原则之应该推行到新闻学院去自不待说。这个学院的修学期间不过六个月，虽比桂林分会的训练班较长，但比起从前北平的新闻专修学校及一些大学附设的新闻学系都太短了。在这短促的时间，基本的科目虽已设立，但讲师讲授的时间究竟有限，此外，新闻记者还有种种的知识和技能应该去学习。所以，课外的集体活动比起室内的讲授来，纵不是更重要的一点，也有同样的重要。同学们应该分成种种的讨论和研究小组，利用星期六晚上和白天的时间，把课室所得的知

识，加以消化和补充，以及作其他与新闻工作有关的活动。能够这样子做，我们的六个月，便能够赛似人家一年两年。

其次，我们的学会并不是学究式的团体，而是要把这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的。我们这学院也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不是像一般大学的新闻系那样注重书本上的知识，注重纯理论，而是要把新闻学的理论与工作联系起来。我们不单是学习理论，而且要学习工作。即在讲授理论的时候，也应把目前新闻工作上的现实问题与之配合。自己办壁报，油印报，采访，写作，投稿，到报馆和通讯社参观以至实习，都是把理论与实践联系的很好的办法。这不独需要讲师们的领导和帮助，而且还期望本港各报馆通讯社以至社会各界给以种种的便利和指导。

第三，正如“学会”一样，新闻学院也是为适应抗战的需要而设。战时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和迫切，不特需要新闻工作者在量上的急速增加，而且要求他们在质上的改善。所谓质的改善，并不是单纯地意味着增进新闻从业员的职业上的知识和技能，使我们能更有效地为抗战宣传，而且是应使新闻工作者真正变成一个站在自己岗位上用笔杆抗战的斗士，或制造“纸弹”的工人，抗战的中国要求它的新闻工作者对神圣的民族战争有坚决的信心，正确和深切的认识，以及为抗战而刻苦牺牲的精神。在高等难民聚，汉奸报纸猖狂，荒淫无耻的风习盛行的香港，这些条件对于新闻工作者更属重要。因此，我希望以培养战斗的新闻工作者为职志的中国新闻

学院，对于这一点特别注意。

最后，因为香港是远东的一个舆论中心，对海外华侨和国际宣传的前站，与华南战区又相隔咫尺，对于华侨和华南战区，我们的香港分会有它的特殊任务，它主办的新闻学院自也有它的特殊使命。比方以南洋各地而论，那里的华侨对于祖国的抗战的拥护和援助最为热烈，对于抗战的一切最为关心，因此，战争发生以来，华侨的报纸和读者增多不少，而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的需求也随着增加。怎样供应海外华侨报纸以适当的人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说到华南战区的新闻工作，我们更感到惭愧。广州失陷后，那里原有十数家报馆差不多都不能够移植别地。有一个时期，韶关、翁源等地望香港报纸，如大旱之望云霓。反顾敌人，每陷一大城市便赶紧进行报纸的反宣传，汉奸报纸相继出现于广州和海口。至于华南的通讯网报道网的种种缺憾，更是一般人都知的事实。在华南战区各地开办地方报、阵地新闻，在沦陷区办报，以及建立完备的战地通讯网，都是目前应该努力的事。香港既是新闻业和知识青年荟萃地方，而又有种种的利便，香港新闻界对于海外华侨报业和华南战区自应担负新闻人才“蓄水池”和供应所的责任。因此，我们的新闻学院也应该针对这两种特殊需要，而给同学们以特殊的训练。

（原载1939年4月27日香港《星岛日报》·《青年记者》）

# 金仲华先生是怎样离开 《星岛日报》的

刘 逸 生

香港《星岛日报》是在1938年8月1日创刊的，金仲华先生进入《星岛日报》任总编辑，则是在1938年底。在此之前，《星岛日报》曾有两任总编辑，即1938年8月至9月任职的祝百英，做了一个月就离开了。继任的是冯列山，也只做了短短一阵，不知何故离开。

金仲华先生进入《星岛日报》不久，邵宗汉先生也参加主笔工作，随后羊枣先生也来了。《星岛日报》的言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详见《告别读者》启事）。不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咬牙切齿，也受到香港政府的密切注视，而国民党反动派则侧目嫉恨，想方设法要把金仲华先生等排除出去，另行派人控制《星岛日报》言论。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仍未停止其阴谋，1940年底，再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制造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直属队等九千余人，在国民党反

动派预布的阴谋之下，在皖南旌德县被包围，六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事后，周恩来同志曾撰《团结起来打敌人》的代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污蔑，并命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一篇反对国民党1月17日反动命令的评论。由于报道和评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周恩来即在报纸留下的“天窗”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一首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深沉曲折地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以及表示对新四军死难烈士的哀悼。《新华日报》把周恩来的手书真迹在报上刊出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掩盖“皖南事变”真相的阴谋，在中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时的香港报纸，绝大多数都刊登了国民党当局发布的歪曲真相、诬蔑新四军的报道，颠倒黑白，含血喷人，使香港老百姓不知真相。

但在金仲华先生主持编务的《星岛日报》，却在2月间（日期已不记忆）复制了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和四言诗，赫然登于国内新闻版上，使国民党当局的欺骗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得以为广大人民所知悉。

国民党的恐慌和狼狈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本来已视金仲华先生为眼中之钉，早已想方设法要把金仲华先生等民主进步人士排出《星岛日报》。但苦于找不到有力的借口，一直拖延着。此事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痛

恨入骨，于是在幕后展开了更疯狂的阴谋行动，他们通过最高层方面，向老板胡文虎施加压力，最后并且答应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程沧波来香港担任《星岛日报》总编辑为交换条件，以达到把金仲华先生等排出《星岛日报》的目的。

胡文虎终于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压力下，同意以程沧波为《星岛日报》的总编辑。

金仲华先生坚持《星岛日报》的工作直至1941年5月31日。就在这一天夜里，金仲华先生值夜班到凌晨3时左右，他向排字房发下了《告别读者》的启事，署名的是金仲华、邵宗汉、羊枣、郁风四人。启事中申述了“由于国内政治逆流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受到了种种限制，使我们不能不向本报当局提出辞职。”并表示“我们今后虽将转换工作的岗位，但我们努力的目标，仍是坚定不移的：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继续奋斗。”

这个启事，和同日刊在《星岛日报》报头旁边的《金仲华 邵宗汉启事》是一表一里的。报头旁边的启事只是说：“鄙人等自六月一日起辞去本报总编辑及主笔职务对于本报今后之言论及新闻记载不再负责特此声明诸希公鉴”。它并未说出此次辞职的原因，而刊出在国内版的这一《告别读者》，却把其中内幕隐约向广大读者透露了。

6月1日《星岛日报》刊出一篇《重申本报的立场》的社论，有人以为这是金仲华先生写的最后一篇社论，其实是完全误会。这篇社论正是标示《星岛日报》言论和编辑

方针转变的印记，是由程沧波撰写的。这篇社论虽然标榜什么“过去本报的主张如此，现在也是如此，至于将来，无论环境如何变迁绝不稍有更易。”然而，下面这些话都是“有骨”的：

“我们……引以为惧的，是目前有一种危机正在潜伏孕育，那就是言论界中有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趋势，长此以往，足以形成对立。”

“对针砭社会，针砭政治，不讳疾忌医，但也绝不敢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另持成见，自陷破坏团结之咎。”

“我们深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不能无的放矢，或者是藉题发挥，增加抗建心理上的障碍。”

以上这些话，细心读者是会体味出它的“弦外之音”的。

正因为这篇社论已预定于1941年6月1日印出（这是报社老板和国民党协商的结果），因此金仲华先生等才在国内新闻版上另刊一则《告别读者》，以明责任。

现将金仲华等先生的《告别读者》启事原文抄录如下：

## 金仲华等《告别读者》启事

（1941年6月1日《星岛日报》刊出）

我们都已辞去本报职务，自六月一起，我们的工作是结束了。